

朝鲜鸿儒金正喜与 清朝乾嘉学术^[1]



艾尔曼

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一、引言

在 17 至 19 世纪时造访北京（朝鲜称之为“燕京”）的李氏朝鲜（1392—1910）译员与使节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日记与游记，我们阅读这些材料通常只是为了了解他们所见到的清代中国（1644—1911），特别是从北京、热河、避暑山庄一直延伸到鸭绿江边境的京畿地区。^[2]与之不同，夫马进（Fuma Susumu）等学者近年来则使用李氏朝鲜时期的资料重新审视造访日本的朝鲜使节的记述。这使我们了解了日本在德川时代与朝鲜的接触，当时江户幕府与清政府还没有直接的联系。^[3]

在近代早期，朝鲜语译员与海外闽南语、粤语、越南语、暹罗语译员一样，能够利用既有的朝贡关系网来发展地区性知识、技术与联络网。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被建构的疆界正借由这些网络而得到界定、形塑和维持，而这些译员也因而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者”角色。在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由这些中介者而得以联接的文化、帝国、地理与学科疆界塑造了早期现代的东亚世界。^[4]

另外，我们也往往错误地认为李氏朝鲜的儒士皆是宋代（960—1280）程朱理学的热切宗奉者。直至 20 世纪，这一由程颐（1033—1107）、程颢（1032—1085）和朱熹（1130—1200）所代表的思想传统在教育和文化上仍被视为正统。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误解，大概是因为当下许多学者看到了李氏朝鲜时期“道学”的兴盛、哲学与道德思想的发达，便不加批判地看待其程朱之学。夫马进已经论证，李氏朝鲜于 1748、1764 和 1811 年造访日本的使节已经注意到“古学”在当时的兴起。同时，一些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节也看到，清代士林中兴起了“汉学”，学者们以新兴的“小学”方法去对待儒学经典。^[5]

朝鲜朝臣金正喜（1786—1856）（见图 1）出身两班贵族，科考及第跻身传统的统治精英阶层。对于将“宋学”视为正统的通常观点，他可谓一个饶有兴味的反面例证。1811 年，朝鲜使节从日本返回汉城，金正喜从他们口中得闻德川学界的新潮流并为之赞叹，而且当时正值金正喜自北京之行（1809—1810）返回不久。^[6]



图1 金正喜 (1786—1856)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与朝鲜的政治形势皆纷纭复杂。各种非法朋党遍布朝廷与地方政府，朝鲜两班与清朝的文士不得不在重重政治险境中实践他们的理想。理想地说，朝鲜的两班家族与清朝的文士家族能够代表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平等主义理想，而另一方面，两班与文士群体不凭靠亲族关系在社会上形成的各种政治组织却皆被目为非法。

朝鲜与清朝重视亲族群体，其原因不难理解。儒家信仰可谓一种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日常实践形式，这种信念将亲族关系作为公共道德（即所谓“公”）的基础并以之促进国家的繁荣。这种理念在程朱理学中得到了最明显的强调。西方社会学所谓国家力量与家族势力此消彼长之说，在此并不适用。1990年之前，朝鲜与中国家族中都没有出现标举个人或自我（即所谓“私”）来对抗国家的情况，其社会演进皆源于政府及其精英群体之间的“公共性”互动。不过，清朝与朝鲜的公共理想也曾被小集团的“自私”所冲淡。^[7]

金正喜在19世纪朝鲜两班学者中影响甚巨，以拥有弟子三千（与孔子一样）而闻名于世。

改革派的“北学”在世纪之末成了一个力主“西化”的团体，金正喜当时即是北学的领袖之一。然而，金正喜身上交叉并纠结着两种身份：他既与北学派有着政治关联，同时也身为两班家族的内部成员，是朝鲜皇室官员世系中的一分子。这种冲突的政治关系——也即家族世系（lineage）与政治派系（faction）的对立——在王室嬗递之际尤为常见，并非当时之特例。^[8]

就澄清对李氏朝鲜之儒士的误解而言，金正喜与清朝古典学者的交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例如，他在24岁时随团出使燕京，见到了翁方纲（1733—1818）和阮元（1764—1849）。众所周知，18世纪晚期，得益于乾隆（1736—1795）时《四库全书》的编纂，许多古代数学佚书重见天日。这些书籍的发现并不局限于清朝内部，但朝鲜和日本在保存中国佚书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9]

阮元重新刊刻了朱世杰（1270—1330）的佚书《算学启蒙》，其所据版本为金正喜回国后在朝鲜找到的1660年本。该本以明代早期某本为底本，于1433年作为教科书进行翻印。《算学启蒙》及其一元未知数算法“天元术”还曾传至日本，在17世纪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表明，19世纪晚期李善兰（1810—1882）的有限离散级数求和法“垛积术”受到了日本关孝和（1642—1708）《括要算法》（1712）的启发。《算学启蒙》在中国重刊之后，通过宁波与长崎之间的贸易路线传到了日本，而关孝和的发现即以此书为基础。后来，李善兰又参与将罗密士（Elias Loomis）的《代微积拾级》（*Elements of Analytical Geometry and of the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和棣么甘（Augustus De Morgan）的《代数学》（*Elements of Algebra*）译为文言文。^[10]

朱世杰此书最早于1299年刊于扬州，以

算筹而非方程的方式描绘了基础的多项式代数（在 19 世纪前期，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准确地称之为“四元术”）。其第一部分介绍了关于加法乘法和转换、差分法、等价性和比例，以及面积和体积问题；第二部分介绍了面积和体积、微分比率和均分法；最后一部分提供了分数运算、盈余和不足（盈不足术）、正数和负数的制表、五阶以内数值方程求根的方法。^[11]

19 世纪前期，几位朝鲜使节曾留驻北京。当时，阮元在国子监担任高官，力主汉学，而他自己也有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其关于古代科技的作品《考工记车制图解》曾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关注。金正喜于 1801 年与阮元会面，后来又将其《算学启蒙》的朝鲜版寄给阮元，而阮元则将他自己的许多作品送给金正喜，其中包括卷帙浩繁的《皇清经解》。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阮元等人非常关注朱世杰在宋元时期“天元术”算法传统形成中所起的作用。1839 年，阮元刊印了这部作品；1871 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又进行重刊，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此书被认为是对于掌握现代代数学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12]另外，戴震（1724—1777）曾为四库全书的编纂而校勘了“算经十书”，于是，秦九韶（1202—1261）、朱世杰、李治（1192—1279）等人的著作昭于天下，而清朝武英殿则曾刊印“算经十书”中的七部。

清代中国、李氏朝鲜与江户日本在近代的文化关系仍有待发现，而在传统数学、天文学与医学等领域尤其如此。我们需要展现朝鲜长期以来在近代东亚文化互动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经学与数学如何通过朝鲜而流通于中国与日本之间。就此而言，我们刚刚踏上探索之路。^[13]以下我将评述金正喜作为一位博学之士的事业历程。

从李氏朝鲜到清代中国：朴齐家的影响

金正喜来自七世为官的缙绅世家，其名声之初起，亦皆因其两班门第。朝鲜英祖（1724—1776 在位）的第二任妻子贞纯王后便是金正喜的直系亲属。金正喜养母的一位族人（金正喜的表兄弟）后来成了朝鲜高宗（后称光武帝）的祖父。1800 年，金正喜 15 岁时与出身名门望族的闲山李氏缔结婚姻。同年，朝鲜正祖逝世，因新王年幼之故，先王之妻贞纯王后垂帘听政。金正喜的父亲受益于与贞纯王后的亲族关系，得以历升高阶。职是之故，金正喜于 1809 年得以成为陪同朝鲜朝贡使团造访北京的二十四名青年之一。1809 年至 1810 年之间，他在中国留驻近六个月，而且很快引起了清朝学者的注意。^[14]

金正喜天赋异禀，自 7 岁起渐以书法闻名朝鲜。对经书的熟稔和书法上的天赋使他很快在清廷结交了诸多汉学文士，并得到了阮元与翁方纲的器重。嘉庆皇帝（1796—1820 在位）在大学士朱珪（1731—1806）及其他朝臣的帮助下扳倒宠臣和珅（1750—1799）（见图 2），正发生在这次 1810 年使团来访的十年之前。^[15]

18 世纪 90 年代，和珅兼任军机大臣与大学士。他自 1785 年正式统领密记处，从认罪的高官手中收缴“议罪银”；另外，当时普遍的地方腐败阻断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和珅据说也曾非正式地担任这种腐败现象的监督者。^[16]

金正喜在北京结交的友人扩展了他的文艺与学术声誉，而许多人知晓其名则仅在他 1840 年遭流放之后。这其中有庄受祺（1810—1866，1839 进士）、赵振祚（1835 进士）、张穆（1805—1849）。前两者来自江苏常州，此地 18 世纪后 20 年间正是抵抗和珅的中心；后者则对顾炎武（1613—1682）治国之学倍加倾慕。

金正喜在一封寄往朝鲜的信中叙述说，乾隆皇帝早年是一位英明之君，但待至世纪之中的太平之世，本有可能媲美汉唐盛世的乾隆之治却进入了和珅时期，是为一大污点。^[17]



图2 和珅（1750—1799）

金正喜钦佩中国与朝鲜的治国之士，还于北学名士朴齐家（1750—1805）（见图3）门下膺受教导。金正喜还未任官职之时，坚持跟随朴齐家研治北学，并撰文批判程朱道学的僵滞严苛。他还寻访钻研朝鲜古代石碑，并尤以辨识考证“北汉山真兴王巡狩碑”而著名（真兴王为新罗中古时期国王，约540年至576年在位）。在赴京之前，金正喜于1809年通过了生员考试，位列甲等。^[18]

朴齐家并非像金正喜一样出身贵族，而是身为庶出之子，无缘两班地位；但在18世纪后期，他以经学研究而自著其名。朴齐家师从另一位北学名家朴趾源（1737—1805），后者曾于1780年来到中国，撰有《热河日记》，亦曾论述中国的文化、艺术与环境。朴齐家于1778和1790年两赴中国，返回朝鲜后，于1778年供职于奎章阁。（金正喜于1801年回国后也供职于

奎章阁，该机构为朝鲜正祖[1776—1800在位]所设立，是朝鲜王朝的皇家图书馆）。^[19]



图3 朴齐家（1750—1805）

陈鱣（1753—1817）（见图4）出身江苏省海宁府，为1799年举人，但未通过1801年北京顺天府的会试。据其记述，1801年，他在北京南城的琉璃厂书肆偶遇时任朝鲜检书官的朴齐家。与陈鱣一样，朴齐家亦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当时正与同僚柳得恭（1748—1807）在琉璃厂寻览书籍。那一日，陈鱣的好友钱坫（1744—1806）也同去书肆。钱坫是嘉定人，为钱大昕（1728—1804）之侄，研习金石铭文，工篆书，与邓石如（1743?—1805）相颉颃。陈鱣、钱坫这两位中国士人与朴齐家、柳得恭这两位朝鲜官员趣味相投，一见如故，皆对新的考证训诂之学抱有兴致。^[20]

此四人碍于语言隔阂，以笔墨交流神会。而且，陈鱣不仅提到了朴齐家1801年之前所撰《贞蕤稿略》，而且加以校订，为之撰序，于1819年左右在中国刊刻。^[21]李德懋（1741—1793）与朴趾源皆赞赏朴齐家之诗，先前都曾

为其诗集撰序，序文也在此时被陈鱣收录。这两篇序文皆称朴齐家文章遒劲有力，因其师法古贤（“为文章如之何，论者曰必学古”）。陈鱣亦钦佩朴齐家，并与之兴趣相合。他自谓“从事于声音文字训诂，已历多年”，而“今阅检书之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22]。



图4 陈鱣（1753—1817）

朴齐家的文章展现了他对考据之学的精通熟稔。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考据之学席卷清代中国、江户日本和李氏朝鲜，成为经学界的前沿显学，文字、音韵与训诂之学广受推重，而陈鱣在序文中即称朴齐家“发明古学，贯通六艺”。朝鲜正祖于1792年组织了著名的“文字策问”，集中讨论“六书”问题，而朴齐家即是对策者之一。陈鱣还曾评价说，朴齐家的“考古证今”直追顾炎武，而后者当时正蜚声于朝鲜学林。在序文中，陈鱣称，刊印朴齐家的“考证之作”，将使人们“咸知崇实学尚风雅，无间于绝域遐陬”^[23]。

朴齐家在阐述其治国思想时叙说了朝鲜科举考试的困境，以及两班贵族社会地位的下降。同时，柳得恭亦曾强调改制与社会的“沿革”，而朴齐家则控诉称，两班贵族垄断科举，道德

堕落，已经引发了朝鲜王朝之中一发不可收拾的朋党分裂局面——我们稍后会看到，这种局面后来恰恰使金正喜遭遇困厄。精英阶层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期望感到沮丧，而这也间接影响了当时的农业经济政策。两班贵族坐享朝廷薪俸，不勤于政务，而社会下层拒绝从事工商业（“上不及于仕宦，下不及工商”）。朴齐家等人针对此状况而倡导一种彻底的新型农业政制：以改善农民生活来吸引不务正业的文武举子安于农耕。在19世纪前期，中国唐代自给自足的屯田制在朝鲜被认为是值得模仿的。^[24]

有趣的是，朴齐家在其文集中回忆了常州官员洪亮吉（1746—1809）（见图5）并对他敬重有加（见于卷三“行状”与“传”部分）。他首先赞扬其“小学”功夫，同时评论说，洪亮吉长于骈文，并继承了《公羊传》的褒贬传统。这些评论表明，洪亮吉将“比事属词”的文学措辞传统与孔子编订《春秋》的历史褒贬传统结合了起来。最后，朴齐家描绘了洪亮吉在乾隆至嘉庆的几年之间（1796—1799）抗击政治腐败的努力。而我们前面也曾看到，金正喜也曾在后来论及和珅这位声势煊赫的乾隆宠臣。^[25]



图5 洪亮吉（1746—1809）

嘉庆前期，翰林学士洪亮吉是对抗和珅的干将之一。1799年，他以一封著名的奏书激刺时弊，触怒新皇，险获死罪。洪亮吉幼时从学于常州庄氏家族，亦娶庄氏女为妻。所以，在看待洪亮吉在嘉庆初年（1799年之前，乾隆仍然在世，仅是“退位”而已）参与反抗和珅势力时，需要考虑到常州是当时反抗和珅的中心。洪亮吉那封奏书写作之时，乾隆已经去世，和珅已被赐死，巨额腐败财产已被没收。当时，嘉庆皇帝的老师朱圭曾为庄存与（1719—1788）一部关于《春秋》的著作撰写了序文。朴齐家在1778年、尤其是1790年的北京之行中接触了当朝政治事件，并在返回朝鲜后进行了记录。^[26]

流放中的金正喜

1819年，金正喜科举及第，受任官职，后擢升艺文馆检阅与奎章阁待制。随着孝明世子逝世，倾向保守的安东金氏得势，金正喜等人则受到压制。金正喜的养父遭流放，至1834年方才返回。朝鲜宪宗（1834—1849在位）继位之后，金正喜得以担任行政职位。然而当时，宪宗年少，其祖母纯元王后垂帘听政；直至1840年之前，安东金氏一直执掌朝政，并制造了1839年迫害天主教事件。

1840年6月，金正喜准备再次出使北京之际，却受宫廷权力斗争所害，被流放至南方一座岛屿，1849年方才获允返回。流落南方期间，他与文艺、与北学、与官宦生活的所有联系都被切断了。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遭流放者不在少数，金正喜的大伯父金鲁永（1747—1807）于19世纪90年代曾遭此厄，其时他仍为一家之长；当时的大学者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因曾经归信天主教（其兄亦为天主教徒）而不为朝廷所容，于1801年遭流放，至1818年返回。^[27]

1842年，金正喜在流放途中获悉妻子逝世，不胜悲戚，作文哀悼，感人至深。1849年，他获允归返，但不久之后，宪宗于1850年逝世（据说因为性病），宫廷之中围绕宪宗的牌位问题爆发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辩论，金正喜受到牵连，于1850年至1852年又被流放至北地。这两次流放途中，金正喜书法精进，其风格被称为“秋史体”（见图6）。他曾在朝鲜乐浪郡精心钻研西汉隶书，而“秋史”之号也暗指孔子《春秋》。阮元曾强调以古代碑刻呈现书法从篆书到隶书再到楷书的发展历程，就此而言，金正喜亦有类似的学术性关注，《阮堂全集》（金正喜一号阮堂）所载《阮堂金公小传》即称他“金石图书诗文篆隶之学，无有不穷其源”^[28]。



图6 秋史体

1844年，流落南方的金正喜创作了他最著名的一幅水墨山水画，《阮堂岁寒图》（常简称《岁寒图》）（见图7）。从书法到绘画，金正喜皆可娴熟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幅画描绘了年将近时的枯寒之景，引人想到南宋与元代的寒林画——罗稚川（1271—1368）《枯木寒鸦图》（见图8）即为此类绘画的典型。^[29]



图7 岁寒图



图8 罗稚川《枯木寒鸦图》



图9 魏源(1794—1857)

金正喜将《岁寒图》赠与其最忠实的弟子李尚迪(1804—1865),以感谢他的情谊。李尚迪身为译员,常有机会前往北京,曾前后往返中国达十二次。在金正喜流放期间,他曾自北京带回诸多卷帙(或许淘自琉璃厂书肆)并寄给自己的老师。对一位流落远方的人来说,这些书籍弥足珍贵。这些书中有魏源(1794—1856)(见图9)于1821年至1826年为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1785—1848)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与恽敬(1757—1817)的《大云山房集》。恽敬也是常州文士,文章综括国政、经学与诗文,与张惠言(1761—1802)同为阳湖古文派创始人。^[30]

这幅《岁寒图》以简寥的笔墨勾勒出一所陋室,其四周有几棵大树,两棵为铁干虬枝的老松。在元代,汉族文人无法担任官职,而这种风景题材恰在当时在“开花结果”。自南宋后期开始,无法施展抱负的文人逐渐为其自我表达找到了一条成熟而微妙的途径。这些文人在聚会之时常常在绘画中表现对隐士理想的崇慕,借由对茅屋陋舍的白描而表达出一种象征意义。此类水墨山水画既体现了技法的师承渊源,亦透露着画者内心的律动,于形式与内容皆有创获。金正喜在坚持道德操守的同时表现了安贫乐道的精神,传达出他所面临的矛盾困境——他并不仅仅是有志不遂,而是被迫放逐,不得

已而隐遁远方。^[31]

人们欣赏中国元代隐居之士的画作时，常会想到元朝统治给文人带来的困厄：宋代以科举考试为基础的选贤制度虽然在元代偶尔被统治者模仿，但整体而言，科举的规模自1240年至1368年已大大萎缩，而元代隐士画作上所题诗文，也常见愤懑的政治抗议与归隐的志愿。罗稚川等人的寒林画总是以树喻人，而松柏则常被作为友情的象征。事实上，他们援引的是孟子以贤君为“乔木”的著名说法。^[32]在这幅《枯木寒鸦图》中，罗稚川将乌鸦呈现为“耿介”的禽鸟，在其中寄托了遁世的隐痛。^[33]

身为两班贵族，金正喜虽然遭逢困厄，却可以借由“中国—朝鲜”文化而对自己的命运有清晰的把握。当时的朝鲜皇室滥用权力，贤能常常遭遇不公的待遇。我们还可以看到，前文所引朴齐家《贞蕤阁集》的书名亦是以松为题。另外，金正喜在给李尚迪的一封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松柏是贯四时而不凋者，岁寒以前一松柏也，岁寒以后一松柏也，圣人特称之于岁寒之后。^[34]

金正喜于《岁寒图》上题文赠与李尚迪，以表感激。李尚迪虽仅是一名译员，诗作与书法却十分出众，屡获清朝文士嘉赞。1845年，他携《岁寒图》来到中国，将之示予新认识的常州文士，如庄受祺与赵振祚。获知金正喜遭遇流放之后，十六位中国文人作文题跋，以示敬意；李尚迪将之与画作一同辑录，创制了一卷带有政治抗议色彩的艺术卷轴。李尚迪回国后，许多朝鲜文士亦为之题作诗文，造就了一件汇集绘画、诗文、书法的艺术作品，表达了沉默的抗议。^[35]

李尚迪返回朝鲜后亦曾将画作与所辑题跋呈示金正喜。这些题跋作者中，常州文士尤其对金正喜所遭不幸深深叹惋，并往往通过述及政治生活固有的危险加以劝慰。庄受祺在1844年的题跋中自称来自常州阳湖，并祝福金正喜，希望他能够不断创作绘画以激励后人。赵振祚则描述了《岁寒图》中高拔而静默的松树：

恒人竞华秀，
君子崇本质。
树无百年计，
豪举诚何益。^[36]

阳湖古文派主要来自阳湖与武进两县，而常州词派在中国更是闻名遐迩。阳湖派与安徽的桐城派皆力主宋明古文，而宗奉汉学的学者却倾向于骈体文。19世纪前期，金正喜还结识了几位治今文经学的学者，如庄述祖（1750—1816）、张惠言、刘逢禄（1776—1829）等。^[37]

恽敬是常州庄氏文人的挚友，其文章多涉公羊学与今文经，并影响了鸦片战争（1839—1842）之前几位重要经学家如龚自珍（1792—1841）与魏源的治国思想与今文经学。金正喜后来的“学术变”思想，正借鉴自这些理论。龚自珍与魏源皆于北京从学于刘逢禄，而后者则是庄存与的曾外孙。恽敬熟读经史，其家族也久以文章而著称于世，然而他却未任高官，官仅至江西南昌府吴城同知，1814年遭劾，卸职闲居。^[38]

恽敬著有《三代因革论》八篇，别开生面地将古文与今文经结合在一起，以前者为政治表达之途径，以后者为制度变革之景象。他以三代制度的渐次更革为理论前提，力图唤起圣贤的改革精神。清代文人与当时的朝鲜文人一样，往往将义理、政治、文学诸方面加以融汇，

就此而言，恽敬此文堪称典范。其开篇即表明，思想变革蕴含于《公羊传》与古文之中：

圣人治天下，非操削而为局也，求其罢之方而已，必将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圣人之法也。

“合乎人情”一语回响着 18 世纪后期对人之情志的重估。在这八篇文章之中，恽敬叙述了《公羊传》理想化的夏商周“三世”，并引述了圣人所带来的制度沿革，以之证明与时俱进的制度变革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39]

《毗陵文录》收录了董士锡（1782—1831）的《庄氏易说序》，终于在 19 世纪 20 年代通过文学选集的方式使庄存与的经学闻名朝野。后来，魏源还曾论及庄存与对抗和珅之事，以及其《易经》研究。常州庄氏文人继承发展了更早的综合文章与治国两者的趋向。董士锡亦是常州文士，治汉学。在《庄氏易说序》中，他描绘了庄存与在乾隆最后十年的动荡中对朝政所产生的影响：

其为文辩而精、醇而肆，旨远而义近，举大而不遗小，能言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巨汇也。^[40]

在 19 世纪，文人团体不断涌现，而阳湖古文派可谓开先声者，其中许多学者于文学与经学皆有造诣。张惠言是一位声誉卓著的文体家，恽敬则是崇慕古文的一员干将。阳湖派与其他地区的许多文人亦有来往，从而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文人群体。他们于文章政事有着类似的关切，对和珅时代的弊病都十分留意。阳湖派的美学气象也十分阔大，汉宋之学皆被囊括在内。

常州派的文学与政治传统可以远溯至黄景仁（1749—1783）。该派文人还包括赵怀玉（1747—1823）、洪亮吉、刘逢禄、庄绶甲（1774—1828）、李兆洛（1769—1841）等，他们皆活跃于 18 世纪后期与 19 世纪前期。与张惠言、恽敬一样，他们都将常州的政论、文学、今文经学传统灵活地加以融合。通略言之，对于文人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何种作用，常州文人的观点经历了一场改变，而庄存与的公羊学与刘逢禄的今文经学即是这场转变的一部分。我们并不能断言这些今文经学的早期形式就带来了这场转变，不过，公羊学的确确证了汉宋之争所带来的思想与文学变革。而且，那些前往北京的使节也使这些思想潮流来到了朝鲜王朝。

对于此种文学与经学新趋势的汇融，我们可举张惠言为例。在他看来，词这种文学形式亦可承载“微言大义”，心系天下的词人以之隐晦地表达对时事的批评。词是一个文人表达价值与情感的恰当形式，它要求作者淹博于籍籍，因而类乎辞赋，又要求体式之复杂，因而类乎古文。因此，张惠言认为词可以涵纳对政治事件的直接批评。既然《诗经》与《春秋》作为“比事属词”的诗文直接展现了周朝之古典价值的衰亡，词人因而也可以将自身所处的社会付诸比兴寄托；既然许多士大夫在过去确立了一种强调社会担当的写作传统，当代作者也可以对现实进行批评，并“代圣人立言”。^[41]

四、尾声

金正喜大概对这些中国与朝鲜友人的主张十分熟悉。他并不遵循程朱道学的泛泛之论，即那种以宇宙天理来关照人之心性，进而把握人之价值的恒常性思路。在《学术辩》一文中，金正喜没有追随丁若镛与朱熹、王阳明

(1472—1529)的形而上学争辩，而是在价值立场上更接近洪大容的实学。^[42]

金正喜在该文开篇说道：“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然而，少数的新派学者终将取代老派，对新学术的抵制也终将消退。有趣的是，一旦新学术被体制化，新一轮变革也成为必需。这种思想革易的理论可以于历史中得到确证，例如，经过战国争雄、《春秋》沦丧的时代之后，五经的价值又于汉代得以确立。^[43]

在金正喜看来，周代的经典虽于汉代得以制度化，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挑战，是为“学术之一变”。在郑玄（130—200）及东汉经学之后，唐朝对儒典的整合带来了另一个巨大转折，但宋代“道学”又起而将“四书”加诸汉唐“五经”之上，略过汉代传注与唐代义疏而追溯周代经义，对五经的核心进行重诠。宋元之后，明朝前期又成为一次学术整合期，朱熹的学说从边缘而成为经学主流。就此而言，金正喜论述说，清代与朝鲜两班学者皆出现了对程朱道学的反动，因对后者的墨守已经成为学术发展之羁绊。^[44]

在篇幅更长的《实事求是说》中，金正喜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自汉至清的学术变革。文中屡次以“一变”来形容文化更替。第一个“一变”来自于“晋人讲老庄虚无之学”；第二个是佛学、尤其是禅学的兴盛，中古与两宋学人皆受其影响。宋儒继而摒弃汉代经学，甚至“引儒入释”，而其中原因在于，汉儒没有像宋儒一样将五经的意蕴详加阐发。^[45]

在清代，宋学空虚之弊益显，汉儒之学得以复兴，正因为“夫圣贤之道在于躬行，不尚空论；实者当求，虚者无据”。金正喜呼吁，如今已是摆脱汉宋双方之谬误与偏见的时候了。

学者需要摆脱当时的汉宋之争。“不必较郑、王、程、朱之短长，不必争朱、陆、薛、王之门户。”^[46]

虽然考证之学在19世纪前期仍是一门显学，却受到了宋学与今文经学的挑战。宋学与今文经学关切道德与政治，而此二者恰为考据之学所忽略或摒弃。不过，仍然致力于“道学”理想的学者却并不完全排斥考据方法。这种综合论的倾向力图将汉宋之学加以通融调和，因此，此二者越来越难以保持为两个孤立的学派。阮元在广州和云贵度过晚年时逐渐专注于哲学主题，正体现了19世纪经学中的张力，而朴齐家、金正喜等朝鲜学者造访中国时，亦有着同样的感受。^[47]

整体而言，金正喜将汉学作为经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而接受下来。在其《汉儒家法说》一文中，他描述了三种汉学学统：一是“守师说”，二是“通小学”（“究其训诂转借”），三是“明天人之理”。更重要的是，他还描述了治“小学”的两个切入点：文字（“研六经从文字入”）与音韵（“研文字从声形入”），以及三种汉学的“释经之体”：“以经解经”、“以字解经”与“以师说解经”。汉儒家法对经学研究十分重要，“家法精，经学明；家法弃，经学废”^[48]。

金正喜还认为，汉儒之法是证明古文《尚书》之真实性的最佳方式。他还曾辨析古代典籍中的“理”字，以表明朱熹将后起之义附入该词的做法是可疑的。而且，在金正喜看来，朱熹实际是以佛解《论语》——“此释氏论语，非孔氏论语者”^[49]。

就金正喜对经世治国之学的兴趣而言，我们需要注意到，他也曾目睹鸦片战争的发生，而且读过魏源为应对外国侵略而作的《海国图志》。前文曾提及，金正喜曾读到魏源自19世纪20年代起编纂的国政文集。在他看来，魏源

通过反驳惠栋（1697—1758）与戴震（1724—1777）的文本训诂之学而为汉学开启了新的方向，而其汉学染上了今文经学的色彩。^[50]

金正喜赞赏魏源“不守训诂空言”的做法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他看来，魏源十分及时地展示了外国势力的威胁（尤其是大英帝国），而其中也可见出当时外国势力与先前传教士的不同。英国所绘地图之精细，已经“非南怀仁坤輿全图之比，又非中国皇輿全图之可与据议”。显然，魏源 1842 年所传达的世界新图景，已经远远超越了早先的耶稣会士。^[51]

在金正喜看来，《海国图志》弥足珍贵，其中记录的制船技术可供朝鲜学习。在 16 世纪，中国曾以火炮应对倭寇的侵扰，然而英国威胁却突如其来，中国与朝鲜皆未做好应对的准备。金正喜说道，不知中国此次遭受英国侵略，与曾经的倭寇之事是否类似，也不知西方的威胁还将持续多久；虽然这种威胁“以所传闻之世见之，则不过纸上空言”，但若“以所见之世见之”，则魏源所传达的信息必须严肃对待。^[52]

金正喜及其同侪的这些观点已经不自觉地开始离开他们尤为熟悉的 18 世纪近代世界。这其中包括对东亚的区域性世界的理解，以及承受“第一波”西方宗教与技术的到来（借由耶稣会士、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更为现代的世界：西方的坚船利炮，世界各国的竞逐挑战了清代中国在东亚的统治地位。不过，金正喜并没有预测到中国“衰落”的未来——先是败于大英帝国，继而败于崛起的日本，而且后者还于 1895 年侵占了朝鲜和台湾。^[53]

魏源与金正喜当然无法像我们一样知晓他们身后的世界，不过，他们却会在 1842 年之后看到“他们”的未来充满众多可能，而我们却会被鸦片战争耀眼的历史所遮蔽，无法对之加

以体会。魏源的《海国图志》影响深远，1842 年首刊时共五十卷，1847 年扩增至六十卷，1852 年第三版（终版）时已达一百卷，而金正喜很可能读过全部三版，从而知晓世界形势如何日新月异。

金正喜等人行至北京、热河、江户、大阪等地并结识了众多朋友，而我们则可从中看到一个初具规模的东亚社会文化世界；经学、文学、政治与艺术在这个世界中相互交织，同时，近代东亚贸易（可谓正处于“白银时代”）也促进了东亚的社会文化联系。金正喜作为一名“中介者”的角色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后乾隆时期”中国文人与朝鲜两班贵族的政治意识，而通过关注朝鲜文人如何回应新兴于清代中国与江户日本的经学潮流，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朝鲜王朝的文化史与思想史。

（时霄译）

注释

[1] 我在奎章阁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时，曾得到首尔国立大学 Kim Yung Sik 教授与 Lim Jong Tae 教授的热情款待，本文初稿亦得到了二位教授的评论和指教，在此谨致谢忱。在此亦向时霄的翻译工作表示感谢，文章倘有错误，皆由我本人负责。

[2] 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100 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30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 Woobing Ha, “Sirhak in Late Chosŏn Korea and Ancient Learning in Early Modern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Interaction,” *Korean Studies*, 30 (2006), pp. 91–109; 夫马进：《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亦参见夫马进：《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

中国·日本》，伍跃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Sixiang Wang, "The Sounds of Our Country: Interpreters,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Early Chosŏn Korea (1392–1592)," in Benjamin Elman, et al., *Rethinking East Asian Languages, Vernaculars, and Literacies, 1000–1919*, Leiden: Brill, 2014, pp.58–95. 亦参 Simon Schaffer, et al., eds., "Introduction," in *The Brokered World: Go–Betweens and Global Intelligence, 1770–1820*, Sagamore Beach: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2009, pp. ix–xxxviii.

[5] 夫马进：《一七六四年朝鲜通信使と日本の徂徠學》，载《史林》，459号，2006，1~33页；艾尔曼：《〈论语义疏〉与皇侃“叙”在德川时代日本的复活及其在浙东的刊印》，见《全祖望与浙东学术文化》，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5~109页。

[6] 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140页。参见 Kim Sung Woo, "A New Challenge to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osŏ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8(2005), pp. 243–269.

[7] 参阅 Erica Brindley,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Concepts Si (Private Interest) and Gong (Public Interest)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26, 2 (2013), pp. 1–31, Ari Levine, "Public Good and Partisan Gain: Political Languages of Fa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d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3, 4 (2012), pp. 841–882, and Benjamin Elman, "Rethinking 'Confucianism' and 'Neo-Confucianism'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Rethinking Confucianism: 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 Japan, Korea, and Vietnam*, eds. Benjamin Elman, John Duncan, and Herman Ooms, Los Angeles: UCLA Asian Pacific Monograph Series, 2002, pp. 518–554.

[8] 北学派的成员来自汉城一小部分有势力的两班宗族（“京华世族”），他们在18和19世纪主导了朝廷。朝鲜晚期的这种改革之学被称作“实学”。一个世纪以来，实学常被用以形容朝鲜的现代性“萌芽”，但如今的史学界往往认为如此描绘李氏朝鲜晚期的文化与思想史是有问题的。当时，众多的学派、潮流与派别（有些甚至有很强的“道学”倾向）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对朝

鲜社会进行改革。

[9] 金正喜：《阮堂全集》，见《韩国文集丛刊》，第301册，8.5a–5b/147页，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此版底本为1867年首版，我还参考了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奎章阁图书馆所藏《阮堂集》手稿本。亦参 Benjamin Elman, "One Classic and Two Classical Traditions: The Recovery and Transmission of a Lost Edition of the *Analects*," *Monumenta Nipponica*, 64, 1 (2009), pp. 53–82.

[10] 参见 Roger Hart, "Tracing Practices Purloined by the 'Three Pillars'," *The Kor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4, 2 (2012), pp. 287–357, esp. 330–342, and Yoshio Mikami, "On the Japanese Theory of Determinants," in *Science &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ed. Nathan Sivin, NY: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1977, pp. 3–30. 参较 Annick Horiuchi, *Les Mathématiques Japonaises à l'époque d'Edo*, Paris: Vrin, 1994, pp. 179–182, and Andrea Bréard, "On Mathematical Terminology: Culture Cross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eds. Michael Lackner, Iw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 Leiden: Brill, 2001, pp. 318–320.

[11] 参阮元《序》，见朱世杰：《算学启蒙》，1a–4a页，上海，江南制造局，1871年刻本。参较 Lay-yong Lam, "Chu Shih-chieh's Suan-hsueh ch' i-meng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Studies)," *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21, 1 (1979), pp. 1–31.

[12] 参见藤塚鄰：《日鲜清の文化交流》，77页，东京，中文馆书店，1947；《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111~113、400页。

[13] 对于追溯古代与中古时期佛教在中日韩之间的传播而言，此类地域分析也是必要的。

[14] 金正喜：《阮堂全集》，7.1a–2b/18–19页。

[15] Nancy E. Park, "Corrup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 4 (1997), pp. 967–1005. 亦参 Wang Wenshe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Social Crises and State Retreat in the Qing Empire, 1790–181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16] Betsey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233. 亦参 R. Kent Guy,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and Ting Zhang, “Penitence Silver and the Politics of Punishment in the Qianlong Reign (1736–1796),” *Late Imperial China*, 30, 1 (2009), pp. 34–68.

[17]《阮堂全集》卷首载有《阮堂金公小传》，闵奎镐撰，见 1a–2b/7 页。金正喜论及和坤的书信，参见 3.42a/71 页。

[18]《阮堂全集》，1a–2b/7 页。

[19] 参朴趾源：《燕岩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 252 册，1.2a–3a/13–14 页。亦参 Yang Hi Cheo–Wall, trans., *Pak Chiwon. The Jehol Diary*, Kent: Global Oriental, 2010.

[20] 参见陈鱣为朴齐家《贞蕤阁集》所作序文，见朴齐家：《贞蕤阁集》，见《韩国文集丛刊》，第 261 册，3a–4a/596 页，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

[21] 同上，亦参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GuYanwu and King Chǒngjo’s Philology Examination of 1792,” Exercise 7: Quotations, EAS 502, Spring 2011 paper, pp. 1–24.

[22] 参见《贞蕤阁集》所载朴趾源序文，1b/595 页。陈鱣之语见前引序文。亦参李德懋：《入燕记》，见《燕行录全集》，第 57 册，439 页。参较朴趾源：《热河日记》，见《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 21 册。

[23] 陈鱣序文，如前引。Saarela, “GuYanwu and King Chǒngjo’s Philology Examination of 1792.” 参较朴齐家：《贞蕤阁集》，22a/605 页。

[24] 朴齐家的农业改革始自其《北学议》。参见《贞蕤阁集》，1.11a–14b/600–601、1.18a–b/603、1.12a–b/600、1.13b/601、2.8b–11b/622–624、2.9b/623、2.11b–13a/624–625 等页。东亚近代的军事、社会、环境史，参 Masato Hasegawa, “Provisions and Profits in a Wartime Borderland: Supply Lines and Society in the Border Region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1592–164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h.D. Thesis in History, 2013。

[25] 朴齐家：《贞蕤阁集》，3.32b/652–653、3.33a/653、3.33b/653 等页。参见 Benjamin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 Kinship: The Ch’ang–chou New Text School of*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26]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 Kinship*, pp. 108–116.

[27] Mark Setton, *ChǒngYagyong: Korea’s Challenge to Orthodox Neo–Confucian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28]《阮堂全集》，7.11b/134 页；2a/7 页。

[29] Sung Lim Kim, “Kim Chǒng–hǔi (1786–1856) and Seihando: The Evolution of a Late Chosǒn Korean Masterpiece,” *Archives of Asian Art*, 56 (2006), pp. 31–60, and Charles Hartman, “Literary and Visual Interactions in Lo Chih–ch’uan’s ‘Crows in Old Trees’,”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28 (1993), pp. 140–145.

[30] Kim, “Kim Chǒng–hǔi (1786–1856) and Seihando: The Evolution of a Late Chosǒn Korean Masterpiece,” pp. 32–35.

[31] Charles Moffat, “Mountain Water,” i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part of The Art History Archive–Chinese Art, July 2008, at: <http://www.arthistoryarchive.com/arhistory/asian/Chinese–Landscape–Painting.html>.

[32] 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29–38; Hartman, “Literary and Visual Interactions in Lo Chih–ch’uan’s ‘Crows in Old Trees’,” p. 137; 亦参 D. C. Lau trans., *Menic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p. 67.

[33] Hartman, “Literary and Visual Interactions in Lo Chih–ch’uan’s ‘Crows in Old Trees’,” pp. 145–162.

[34] 金正喜：《阮堂全集》，32b/88 页。

[35] Kim, “Kim Chǒng–hǔi (1786–1856) and Seihando: The Evolution of a Late Chosǒn Korean Masterpiece,” pp. 31–60. 日本学者藤塚鄰（1874—1974）后来于朝鲜购买了这一卷轴作品并一直收藏于日本。1944 年 12 月，韩国收藏家孙在馨（1903—1981）在不懈的请求之后将之购入，使之得返韩国，而藤塚鄰所藏金正喜其他书画作品却于 1945 年东京轰炸中悉遭焚毁。

[36] Sung Lim Kim, “Kim Chǒng–hǔi (1786–1856) and Seihando: The Evolution of a Late Chosǒn Korean

Masterpiece,” p. 38.

[37] 金正喜:《阮堂全集》, 33a-34a/26 页。

[38] 同上书, 25b-26b/21 页。

[39] Benjamin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 Kinship: The Ch'ang-chou New Text School of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307-317.

[40] Ibid., pp.109.

[41] Ibid., pp.297-298.

[42] 参较 Song Young-bae, “Countering Sinocentr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Korea: Hong Tae-Yong’s Vision of Relativism and Iconoclasm for Refor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9, 3 (1999), pp. 278-297; Gari Ledyard, “Hong Taeyong and His Peking Memoir,” *Korean Studies*, 6 (1982), pp. 63-103.

[43] 金正喜:《阮堂全集》, 35a-37a/26-27 页。

[44] 同上。

[45] 同上书, 25b-26b/21 页。

[46] 同上。亦参 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p. 284-287。

[47] 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85.

[48] 金正喜:《阮堂全集》, 21b-23a/19-20 页。

[49] 金正喜:《尚书今古文辨》, 载《阮堂全集》, 30a-33a/24-25 页;《理文辨》, 33b-34a/25 页。

[50] 参见 Benjamin Elman, “The Relevance of Sung Learning in the Late Ch’ing: Wei Yuan and the *Huang-ch’ao ching-shih wen-pien*,” *Late Imperial China*, 8, 2 (1988), pp. 56-85。关于魏源的影响, 参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85-295, 301-304。

[51] 金正喜:《阮堂全集》, 34a-34b/68 页。

[52] 同上书, 35a-35b/68-69 页。

[53] 金正喜后来还曾结交申纬(1769—1845)、吴庆锡(1831—1879)、闵台镐(1834—1884)、闵奎镐(1836—1878)、姜玮(1820—1884)等人。